



晋冀鲁豫边区 财政工作的片断回忆

戎子年

六、救济灾荒

日本侵略军对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扫荡，自一九四一年开始加剧，并在铁路、公路两侧构筑封锁沟墙，晋冀鲁豫边区形势日渐严重，四个行署区之间的交通已很困难，从一九四二年起，冀南区已成为游击根据地。正当边区军民集中力量展开对敌斗争，反击蚕食之际，一九四二、一九四三两年连续发生了五十年来最严重的旱灾。冀南区大部分地区、太行区的三个专区、冀鲁豫区沙区和沿平汉铁路东侧，农业收成平均只达到二成至三成左右，个别村庄甚至颗粒无收。整个晋冀鲁豫边区需要救济的灾民约有一百五六十万人。由于两年大旱，一九四三年七月间，太行区的武安、磁县、沙河、林北县，冀南区的大名、魏县、元城等县又发生了蝗虫灾害。蝗虫最多的地方飞起来遮天蔽日，落到地里，几亩几十亩庄稼顷刻被吃光，落到树上树叶被吃光，落到人的头上也有被咬伤的。同年八、九月暴雨又成灾，太行区浊漳河和清漳河两岸冲走大量滩地，冀南区、冀鲁豫区的卫河、运河、滏阳等河多处决口，不少县区一片汪洋，淹没村庄三、四千个。

边区连续两年的严重灾荒，敌人趁火打劫，刮起造谣破坏之风。灾区的部分干部和灾民也产生了一些消极、悲观、失望的情绪。市场上物价波动，食品价格大涨，衣物家具等的价格则大跌。社会秩序动荡，人心不安。面对这种形势，中共中央北方局、太行分局，八路军前方总部，一二九师师部，边区政府等党政军领导机关，先后发出了救灾的决定和指示，号召边区军民一面要继续加强对敌斗争，深入

贯彻减租减息政策；一面要以度荒为中心，开展群众性的救灾度荒运动。

当时的救灾度荒方针和办法有以下几项：

一、减免灾区人民公粮征收。仅太行、冀南两区，一九四二年的公粮比一九四一年减免了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有的县减免三分之二。据回忆，太行区一九四二年减征公粮达三千另八十万斤。

二、增拨粮食救济灾区。太行区，在一九四二年拨出救济粮五百六十万斤（当时每个灾民每天救济粮以新秤四两计算），通过贸易，由西部非灾区购粮调剂供应东部灾区（加变卖公粮）达四千六百万斤。银行贷放救灾款二千万。太岳区，一九四三年拨灾区救济粮和贷粮达六十多万斤，调剂粮食三百二十六万斤。冀南区一九四四年春，贷给灾民粮食六百万斤救济春荒，支援春耕。冀鲁豫区，一九四三年除拨粮救济本区灾民外，还支援冀南区粮食三百万斤，麦种五十万斤。

三、实行以工代赈。边府及所属工商总局通过贷粮贷款和拨粮拨款，恢复和兴办了水利、纺织、运输、家庭副业和各项生产事业，救济了大量灾民。边区政府一九四三、一九四四两年，拨粮一百多万斤，拨款四百三十万元，用于生产救灾。涉县清漳河、漳南和黎城浊漳河漳北、漳南，穿山劈岭，开凿隧道，修建了三条大渠，可灌溉耕地一万多亩。这是太行山有史以来未有过的大型水利建设。修渠的民工都是灾民，每个工每日发三斤小米，有的民工领到小米，除自己吃外，还节省一点送给家人。

由西部调运东部的粮食，运粮队雇的也是灾民，共赚脚费粮八百余斤。

开展纺织运动。边区大部分地区的妇女，一向有纺线织布的习惯。当时规定纺一斤棉花给二斤小米（边区党政系统男女干部不少人学会了纺线，有的还将收入的手工费捐济灾民），共赚小米一千一百万斤。此外，还开展了其它副业，如刨药材、砍柴、编草帽辫等，赚得小米也不少。

四、订立安家计划，厉行节约，开展灾民互济运动。生产救灾，不只是受灾的县、村要做计划，需救济的家庭都要做计划。安家计划内容包括：缺粮多少，野菜代替食品补充多少，从赈工生产中赚取粮款多少，最后请政府救济多少。在灾荒严重期间，党、政、军、工厂、学校、公营商店的职工、战士，为了省出粮款救济灾民，除每人粮食定量各减少四两外（参看第二篇《供给标准》一文），有一段时期还减少了七两。部队机关人员连津贴、菜金、甚至办公费，都由自己生产解决，不要公家发给了。在晋冀鲁豫边区最困难时期，山东军区司令部还节衣缩食，捐助我们灾区北海币一千万。与此同时，我们还鼓励发扬友爱精神，开展灾区各阶层人民之间的互济互助，邻里之间、亲戚之间，有粮的接济无粮的，粮多的接济粮少的，务求不饿死人。据太行区不完全统计，互济小米即达一千五百四十万斤。

五、采集野菜，准备代食品。一九四二年秋和一九四三年秋，灾荒发生后，边区党政军机关，立即发动群众开展了采集野菜、准备代食品的运动。仅八路军前方总部每人平均采集野菜晒干的就有一百多斤，边区政府机关一九四三年一个月即采集三万斤。至于灾民，没有一家不采集野菜、不准备代食品的。采集的野菜种类达一百余种：计有苦苣、荠菜、节节草、车前子、沙蓬、蒺藜子、野苲麦、野豌豆以及榆树、杨树、柳树、槐树的叶子和玉米芯等等。此外，我们还推广了吃野菜的方法，介绍了治疗吃野菜中毒的药方。

六、发动群众，大种晚秋作物，缩短灾

期。一九四二年秋，边区一小部分灾区降了偏雨，灾民补种秋菜，获得了良好的效果。边区党政接受了这个经验。一九四三年事先就号召灾民，责成国营粮店，准备大量购储晚庄稼和秋菜种子，如荞麦、小糜、小黍、六十日苞谷和萝卜、蔓菁、小菜根等，当八月降雨后，立刻开展了大规模的补种，抢种。又获得了丰收。

七、安置灾民，有计划地组织移垦。从历史上看，冀西、豫北地区一遇到灾荒，就向晋东南逃荒。一九四二年和一九四三年遭灾后，冀西特别是豫北灾民大量向太行、太岳两区逃荒，据太行区报告有二十五万人次，太岳区最多时每天达到两三万人。我们对逃荒灾民，除去极少数单身汉和无家可归者给予安置外，绝大部分都发给路费，劝其回去，生产自救。据统计，太行、太岳两区安置移垦落户的灾民约一万余人。

除上述七项工作外，在一九四三年蝗灾中，我们发动广大群众组织起来打蝗虫挖蝗卵。因为那时没有滴滴涕、六六粉等农药，也没有别的好办法，只有动员群众来扑打。这是一次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出现了许多打蝗英雄和模范集体。扑打的结果，据太行区十个县统计，打死蝗虫一千八百二十五万斤，挖蝗卵蝗蛹十一万斤。边区政府发放打蝗奖励粮和挖蝗卵兑换粮达一千万斤。最后把蝗虫基本消灭在太行山脚下，飞到晋东南的很少。用人力扑灭蝗灾，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奇绩。

· 一九四四年七月夏收后，灾荒已完全结束。边区军民欢庆度荒胜利之情，至今犹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

晋冀鲁豫边区人民，在敌祸天灾双重袭击的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取得了救灾度荒的伟大胜利，主要成绩是：

一、边区腹心地区内的灾民，饿死的人仅是个别的，逃亡的人也很少，而游击区特别是敌占区，饿死和逃亡的人就多得难以计数了。一九四三年下半年在八路军解放了的敌占地区（包括国民党遗弃的地区）的粗略调查，晋东南的陵川等县和高平县二十八个村，饿死的人就占原人口的百分之二十，逃亡的占原人口



文昌县一天调走三位税务局长 引起强烈反响

编辑同志：

广东省文昌县税务局由于查补县水产公司漏税一事，引起县某些领导不满，以致先于去年11月17日撤掉了具体经办此事的清澜税务所一位副所长的职务，接着，又在去年12月30日一天之内调走县税务局局长潘正东和副局长李德芳、符之连三人。这件事在海南区税务干部中引起强烈反响。

听到这个传闻的税务干部都认为是一件怪事。事情到底是怎样引起的呢？1982年11月，在税收政策检查中，文昌县清澜税务所查出县水产公司当年1—10月以低价购进高价销售皮仔鱼（进价每斤0.10元，销价0.19元），销售金额68.16万元，应当补税，但水产公司不同意纳税。经多次请示海南区税务局和广东省税务局，均答复应当征税。文昌县税务局根据上级税务局批示，于1983年5月通过银行扣缴了该公司商业零售税款2.1万元。

文昌县人民政府对这一处理有意见。县政府办公室主任在去年5月下旬召开的税企双方会议上，指责县税务局向省税务局写报告不通过县政府是不对的。还说：“我县生产和经济工作中存在的问题，都与税务工作有关，氮肥厂准备转产酒，你们要征税60%；农具厂转产炮竹，你们要征税35%；税率那么高，人家搞得起来吗？水产部门从外地组织海产品回来卖，成本高，你们也要征税，人家亏了本，不愿干，还不如回家睡大觉”。又说：“即使按政策应该收税，但不合理，也要考虑。”

8月，广东省水产厅函复文昌县人民政府，说不该征税。同年9月，县长办公会议作出决定，要文昌县税务局将通过银行扣缴的税款和滞纳金一并退回县水产公司。12月，县人民政府又发文件责令县税务局立即退税，并报告不执行县长办公会议决定的原因。

县税务局接文后，当晚由两位副局长和一位股长

的百分之四十。冀南区的魏县、成安县和豫北的林南（注）、淇县、博爱、沁阳等县，有的村庄饿死的人高达原人口的百分之四十至五十，有的村庄逃亡的占原人口的百分之八十至九十。

二、灾荒不仅没有影响边区人民的生产，而且还刺激了人民的生产。晋冀鲁豫边区的生产合作社、农业、水利事业、手工业、家庭纺织副业都有所发展；军、政、党单位的机关生产，都是在一九四三年和一九四四年前半年发展起来的。一九四四年边区生产获得大丰收，除风调雨顺外，人的主观能动因素起了重要的作用。

三、边区党政军与人民的关系，通过患难与共的救灾度荒运动，进一步亲密团结起来，党政军在人民中的威信，空前提高了！

党中央和毛主席对晋冀鲁豫边区、太行区的救灾、打蝗、度荒工作，曾给予高度评价，毛

主席在“七大”前后，说到我们革命会遇到困难时，多次以晋冀鲁豫的度过灾荒为例鼓励大家的斗志。

我们救济灾荒工作也不是没有缺点的。当一九四二年的严重灾荒突然出现时，先是认识不够，有麻痹思想，后来认识到了严重性，又有恩赐观点，平均施救的情况。如提出“不饿死一个人”的口号，虽然起了良好作用，但也造成了救灾工作的被动。在调剂灾区粮食上是有重大的贡献的，但因对灾情发展变化估计有误，变卖公粮过多，曾一度影响军粮供应，若不是太行分局发现及时纠正，几乎出了大问题。在西部收购粮食上，曾发生过强迫命令。这些教训，值得好好记取。

注：一九四三年前半年，林县的北部地区归太行区管称林北县，南部包括县城，还在国民党军队孙殿英、庞炳勋的管辖下。